

# 南诏王室崇信佛教的始因分析

赵向军

(大理州博物馆,云南大理 671000)

[摘要] 本文从佛教传入南诏社会初期的状况分析入手,阐释了佛教在洱海地区的传播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图说明南诏王室在中后期经历了宗教信仰转变的过程。佛教在南诏的广泛传播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结果,南诏王室崇信佛教的根本原因是维护阶级统治利益的根本需要所决定的。

[关键词] 南诏王室;佛教;阶级利益;客观条件

[中图分类号] B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345(2006)01-0015-04

## A Causal Analysis of Nanzhao Royal Court's Worship of Buddhism

ZHAO Xiang-jun

(Dali Prefecture Museum, Dali, Yunnan 67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situation of Buddhism spreading to Nanzhao community, the paper elaborates so much o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Er'hai region and its social impact, as to show the process of Nanzhao royal court's conversion into Buddhist belief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s of the State and that this conversion results from the need to safeguard the ruling class's interests.

[Key Words] Nanzhao royal court; Buddhism; class interest; objective conditions

唐初,唐王朝的势力与吐蕃的势力在洱海地区不断深入,促使洱海地区各部落迅速分化。唐王朝为了控制洱海地区,阻止吐蕃的扩张,于是大力扶持六诏之中经济水平较高,实力较强的蒙舍诏,蒙舍诏借助唐王朝的势力,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征服其余各诏,吞并洱海地区附近的白蛮各部落,逐渐统一了洱海地区。公元738年,唐王朝册封蒙舍诏诏主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统一地方政权正式建立,结束了云南各族长期分散的局面。南诏建立后,不断向四周扩展势力,其疆域也达到了“东距爨(今滇东北及黔西北部分地区),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缅甸与印度交界处),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老挝川圹、桑怒地区),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今四川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黔西南地区)”的范围。<sup>[1]</sup>

### 1 南诏社会初期的宗教信仰

据文献史料记载,南诏社会初期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统一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形成。在南诏广阔的疆域内,乌蛮、白蛮是主体民族,其余还是大杂处、小聚居着众多部落民族,各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宗教信仰各异。唐·樊绰《蛮书》卷一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大部落则有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鬼主,一切信使鬼巫。”《新唐书·南诏传》也有记载,两爨均有鬼主,且“南路有廓清道部落鬼主三人,波监鬼主十人”,说明乌蛮、白蛮信仰鬼教,有鬼主。而一些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部落,信仰的可能是比巫鬼教还低一个层次的动植物、自然物等原始宗教。例如在《南诏图传》中有“三爨白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并兴宗王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的文字和图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有铁柱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遗俗,此外在《南诏德化碑》中还有“开三教,宾四

[收稿日期] 2004-09-13

[作者简介] 赵向军(1970-),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大理州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民族学调查研究工作。

门”之记载,三教虽没有明指,但从《南诏野史》(王崧本)“丁未太和元年,王(丰佑)母出家,……太和二年,用银五千,铸佛一堂,废道教”的记载来看,南诏当时早有道教,由此可以看出,南诏初期是一个多种信仰并存的社会。

关于南诏蒙氏王室初期的宗教信仰问题,学术界所持观点不一。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一书中通过对大量的文献史料的研究分析指出,《南诏野史》(王崧本):“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五十七山神”以及胡蔚本《南诏野史》:“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之记载当为本主庙之起源,此种宗教,不杂佛教、不杂道教,自为一独立之信仰系统,大理本主庙诸神在南诏时祭祀极盛,在统一六诏之后,主政者遂利用此种宗教,为统治工具。<sup>[2]</sup>公元794年,异牟寻与崔佐时苍山会盟誓文在“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由玷苍誓文所祷诸神观之,则本主庙之渊源于南诏,甚为明白,是南诏时,仍以自然崇拜之原始巫教,为其主神,盖可知也。”<sup>[2]</sup>作为统治阶级在国家正式的祭祀中采用此种仪式,进一步说明南诏社会初期南诏王室以原始宗教信仰为主,这种早期的信仰正是南诏主体民族白族本主、彝族土主信仰之早期形态,亦是当时社会信仰的主流。由此看来,南诏初期王室以信仰原始宗教为主的观点更为合乎当时社会状况。尽管对南诏王室的早期宗教信仰学术界观点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南诏王室早期宗教信仰的主流肯定不是佛教。

## 2 佛教的传入为南诏王室崇信佛教创造了客观条件

2.1 佛教在南诏初期的传播及信佛阶层的广泛形成 佛教传入南诏的通道一共有三条:一是天竺道,由印度经缅甸北部传入,为印度密教阿吒力;二由吐蕃传入,主要是藏密,三是来自内地,由蜀道、黔中道、胶趾道传入,主要是汉密。<sup>[3]</sup>这三支密教传入南诏,大致都在公元7世纪至8世纪之间,但由于传入线路以及规模声势不同,因而各自影响及形成特点也不同。

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传入最早的当数印度密教阿吒力,原因之一是地域上与印度相邻,其二是两地之间商贸来往历史悠久,自汉时开辟的“博南道”和“蜀身毒道”很大一段都途经南诏疆域,蜀滇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为佛教的传入提供

了捷径,印度密教僧侣自然沿此商道传播佛教。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鹤庆府《仙释》载:“赞陀崛多,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揭陀国来。”又《滇释记》载曰:“赞陀崛多尊者,……至鹤庆又腾越州住峰山、长洞山二处,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另外,从佛教传入洱海地区的传说及《南诏图传》所描绘的观音幻化故事,都证实了在六诏并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洱海地区。石钟健先生对其所辑录的九十篇大理古代碑铭进行研究发现,观音大士初到大理时,曾带领天竺七师到大理,传播阿吒力教。由此看来,南诏早期传入的佛教当从天竺道而来。<sup>[4]</sup>

《南诏图传·文字卷》中记载南诏佛教有一条传播线路是“从胡梵而至”,“胡”僧当即西域僧。天宝十年,南诏臣属于吐蕃,南诏与吐蕃关系十分密切,而此时,吐蕃贵族掀起了第一次“禁佛运动”,大量僧人被驱逐,此时的洱海地区白蛮大姓中佛教已经广为流传,洱海地区当是这些僧人理想的避难之所。838年至824年,吐蕃又掀起了第二次“禁佛运动”,僧人被杀,四处逃亡,这时正是洱海地区大兴佛教之时,更不会排斥这些流亡的僧侣。《白古通记》中记载“神僧赞陀崛多,蒙氏保和十六年(839)自西域摩伽陀国来。”说明其路经吐蕃来到了洱海地区传教,而在他之前,其师释利达多,也是从西藏来的梵僧,早已在南诏了。<sup>[5]</sup>在吐蕃禁佛时期,有不少僧人从吐蕃进入洱海地区。这些僧人从吐蕃进入南诏,他们一路上传播佛教,必定吸收了不少信徒,甚至后来赞陀崛多还娶南诏王劝丰佑之妹,成了皇亲国戚。另有部分吐蕃而来的印僧则与上层白蛮大姓通婚,不断扩大了崇信佛教的社会阶层。

中原佛教传入南诏的情况,从很多文献史料和历史文物都可得到证明,据元李京《云南志略》记载,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前,与唐王朝已有佛教往来:“开元二年(714)(南诏)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佛屠像,云南始有佛书。”南诏受唐王朝册封后,每年派南诏大臣弟子到成都学习,先后培养出南诏子弟上千人,当时西川佛教密宗盛行,这些南诏子弟不可能不受密宗思想影响,他们必然充当了把中原佛教引进南诏的中介人。<sup>[5]</sup>太和三年(829),南诏撕毁与唐盟约,进攻成都,掳掠百姓、工匠、僧道四千人,这些僧众在南诏社会从事佛教活动是必然的。中原僧人广泛流入南诏,必然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势力,进而扩大了崇信佛教的

社会阶层,使佛教逐渐成为南诏社会信仰的主流。

2.2 佛教在洱海区的传播及在白蛮社会中的兴起  
西汉以来,洱海地区散为部落,直至唐初,在洱海地区形成了“六诏”等六个较大的少数民族部落。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应属于白蛮的“西洱河蛮”或“河蛮”,与六诏及河蛮杂居于洱海地区。

《南诏图传》所描绘的观音幻化证实了在六诏并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洱海地区。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七载:“观音七化,皆近苍洱,西止云龙,南止蒙舍,北止施浪,东止鸡足。”说明佛教初传时主要在洱海附近,而这里恰巧是白蛮的聚居地,因而可以肯定洱海附近的白蛮首先接受了传自天竺的佛教。石钟健先生对其所辑录的九十篇大理古代碑铭研究发现,观音大士初到大理时,曾带领天竺七师到大理,而七师之一的杨法律按明正统三年(1438)《故宝瓶长老墓志铭》、成化十七年(1481)《医师杨奴碑》、成化二十年(1484)《五密坛主场圭碑》记载,他就是洱海地区本地人。当天竺僧人到洱海地区传教时,洱海地区的各部落还盛行各种原始宗教、巫鬼教等,其中,洱海沿岸的白蛮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其他部落高,对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的排斥相对来说较小。因此,来自天竺的佛教在这些白蛮部落中得到传播,并产生了大量的僧侣及信徒。<sup>[6]</sup>再者,早在唐初白蛮已开始采用汉姓,实行冠姓父子连名制,而后来所有的阿吒力世家都是白蛮大姓,而每一白族大姓也几乎都有自己的阿吒力。<sup>[7]</sup>由此可以说早期的洱海密僧应是白蛮,杨法律就是洱海地区的较早接受佛教的白蛮阶层的代表。洱海地区众多白蛮大姓皈依了佛教,而白蛮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白蛮社会的经济形态成为南诏社会中的先进部分,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尽管蒙氏王室为“乌蛮别种”,但却任用了大量的白蛮大姓首领。因此,从南诏建国之时起,其贵族阶层就主要由白蛮组成,白蛮社会首先接受了天竺密教,许多白蛮大姓首领成了南诏政权中的高级官员,促使了南诏贵族密僧阶层的形成,白蛮社会中逐渐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崇信佛教的社会阶层。

### 3 促使南诏王室崇信佛教的根本原因

3.1 南诏王室佛教崇信的开始  
南诏王室皈依佛教的时间史料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白古通记浅述·蒙氏世家谱》及《增订南诏野史·隆舜》的记载中得知,当南诏王劝丰佑时期,大兴佛教,常请高僧给“三公群臣”即王室成员讲经。而隆舜甚至自

号“摩诃罗嵯”,以“嵯耶”为年号,证明此时王室崇佛已蔚然成风。另按清胡蔚《增订南诏野史·丰佑》所载“(南诏王丰佑)太和二年(828)用银五千,铸佛一堂,废道教。”随之南诏中心地区开始四处建塔、建寺、铸佛。统治阶级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正式宣布废除道教,说明在此之前不排除王室成员和社会阶层中有人信仰道教,而在废道教的同时却“用银五千,铸佛一堂”推崇佛教,由此可以推断,丰佑时期即公元828年左右,是南诏王室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佛教的开始阶段。

3.2 南诏王室改信佛教的内因  
作于南诏末期舜化贞时的《南诏图传》,把蒙氏王室信仰佛教的历史追溯到南诏初期、白蛮开始信仰佛教之时,虽然此举是为了将蒙氏王室统治的合法性与“观音授记”相结合,有力图抬高王室在广大佛教信徒中的地位之意,<sup>[6]</sup>但却有力地证实了南诏后期蒙氏王室崇信的是佛教,但南诏王室为何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改信佛教的,这一根本转变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南诏王室对早期佛教传入的主观态度

据王崧本《南诏野史》载,天宝之战中(754年),南诏王阁罗凤的兄弟阁陂和尚是到吐蕃搬兵的使者,“阁陂有神术,人马十骑往来不过朝夕,唐兵三至三败,乃其术也”。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石钟寺第二窟《阁罗凤议政图》中,在南诏王右边的和尚就是阁罗凤的兄弟阁陂和尚。王崧本《南诏野史》还记载,除了阁陂和尚外,尚有异人白妃及韩陀僧助战。由此看来,佛教僧人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使南诏王室认识到佛教作为统治工具的可利用性,加之南诏与吐蕃政治、军事关系十分紧密,因此自然不会排斥佛教的传入,相反南诏立国至结束,每一代南诏王都封白密高僧为国师,说明南诏王室对佛教的认可。另据《册府元龟》卷九八记载,“太和五年(831)五月,四川节度使李德裕奏,南诏蛮放还先掳掠百姓、工巧、僧道约四千人到本道”,说明南诏主观上有意接受佛教,否则不会掳掠如此多的僧人到南诏。

第二,崇信佛教是南诏王室维护统治,调和阶级矛盾的需要

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有效手段。南诏政权建立后,王室一直是乌蛮蒙氏,而在贵族阶层中则形成了白蛮密僧阶层。这种宗教信仰的不一致状况,在南诏初、中期并没有

影响王室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但到了中后期,王室与贵族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南诏开始出现政治危机,南诏自寻阁劝至隆舜,各代不断改元,屡改国号,试图改变这种危机,然而还是解决不了乌蛮王室与白蛮贵族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甚至出现了公元816年白蛮贵族王嵯巅杀南诏王的极端形式,这种矛盾根源实质是社会发展两种不同生产力斗争的必然结果。“熟悉封建关系,且极力推行封建制的(白蛮)贵族势力日趋膨胀,构成了对南诏王族的威胁,南诏王族的落后性及民族狭隘性,同更高一步的社会形态,同熟悉封建制的贵族间发生了矛盾……”〔8〕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模仿唐制,依靠白蛮贵族来组织政权,经济文化得到不断发展,白蛮大姓杨、段、王、赵等家族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而且每一代南诏王继位,都要封高僧大德为国师,因而南诏王室不得不考虑白蛮贵族阶层的利益和宗教信仰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南诏王室不得不改信佛教,以暂时摆脱政治危机,缓和与白蛮贵族阶层的矛盾,这正是南诏王室崇信佛教的内因所在。

第三,崇信佛教是南诏王室调和社会矛盾的需要

佛教教义宣扬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基本学说,向佛教徒灌输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精神思想,很容易被社会底层的人们所接受。这种思想在面对政治是非甚至是社会整体命运的事变时表现出一种淡泊,能极大的削弱人的抗争精神,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用佛教的这种精神麻痹作用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南诏政权的建立最终是依靠血腥的武力战争来完成的,社会矛盾必定十分尖锐,南诏统治者连年征战,社会俱困,被统治阶级的生活疾苦可想而知,而佛教教义恰好能满足处于战乱后的下层被统治者的精神寄托,这些下层被统治者接受了佛教,同时也就削弱了对上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统治者认识到佛教的精神麻痹作用是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的,因此并不抑制被统治阶级信奉佛教。南诏在短短几十年内用武力征服了众多部落,这些被征服部落经济相对落后,但宗教活动却在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诏在建立统

一政权后,境内的各部落却信仰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是不利于阶级统治的。南诏王室统治者也希望通过一种宗教来淡化被征服部落的民族意识,南诏社会的发展对佛教本身也有一种内在的需求。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被征服民族对佛教的抵抗心理自然要小得多,佛教所倡导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淡化被统治部落民族意识的作用,这些教义思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南诏王室认识到佛教教义思想的可利用和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崇信佛教就成为他们调和社会矛盾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 4 结语

南诏王室崇信佛教经历了一个信仰变迁的过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佛教广泛传入南诏社会为南诏王室改信佛教创造了客观条件,起到了客观促进作用,然这一宗教信仰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由其阶级统治的需要决定的,内外因的共同作用,最终促使了南诏王室在中后期改信佛教,佛教在南诏得以兴盛,延续至大理国时期而长盛不衰。本文仅对南诏王室宗教信仰转变的始因从民族学的角度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由于笔者学识有限,文中纰漏在所难免,请方家多予指正。

#### 〔参考文献〕

-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诏传〔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01.
- 〔2〕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49-260.
- 〔3〕王海涛.云南佛教史〔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161.
- 〔4〕杨学政.云南宗教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5.
- 〔5〕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34-136.
- 〔6〕傅永寿.南诏佛教的历史民族学研究〔M〕.昆明:云南那民族出版社,2003.88-99.
- 〔7〕张锡禄.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吒力.南诏与白族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1.
- 〔8〕木芹.试论南诏王族覆灭的原因.南诏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161.